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

李 俊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19)

摘 要: 基于我国东部农民工城市创业数据的分析,考察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包括初次创业和调查时点的此次创业)是否受其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与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由此,应尽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加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等),帮助农民工开启城市创业,并促使创业者尽快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关键词: 人力资本; 农民工; 初次创业; 发展型创业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8)06-0042-10

一、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创业的研究现状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构成——知识、技术、先前经验等对于创业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作用,其中先前经验一般包括行业经验、职能经验和创业经验[1]。在知识方面,Priyanto 和 Sandjojo[2]认为受教育程度通过转化为创业能力进而影响创业绩效。但对于这一影响是否显著,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Nakhata[3]对中小企业创业者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而 Marvel 和 Lumpkin[4]认为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创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关于先前经验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国外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有四种情况:(1)先前经验对创业绩效没有显著作用[5];(2)先前经验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6];(3)先前经验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创业初期[7];(4)先前经验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呈非线性,这种非线性可能是倒 U 型,即一定限度内,先前经验值的增加可能会引起创业绩效的提升,但是达到一定的阀值之后先前经验值的增加却可能会引起创业绩效的下降[8]。由于总体创业研究缺乏纵向研究,国外关于人力资本对创业历程影响的研究十分少见。

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而言,其人力资本构成除了知识、技术、先前经验之外,还包括城市生活经历。受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构成与大学生、留学归国人员在城市生活经历这一维度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工只有适应极不同于农村的城市环境,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创业。

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在知识维度上,黄兆信等[9]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越高,创业绩效(主要是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方面)越好。在先前经验维度上,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来说,行业经验与职能经验基本上是在打工中获得的,因此打工经历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具有重要价值[10-11]。而创业经验对于创业绩效有着直接影响,因为有过创业经历的农民工通常对创业机会更为敏锐,同时还积累了相关知识、人脉、进货与销售渠道等,创业绩效

收稿日期: 2018-07-19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8.06.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0BRK01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4ZS145)

作者简介: 李 俊(1974—),女,湖北武汉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与社会政策。E-mail:junzi3020@126.com

更高[12-13]。城市生活经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与创业也有一定影响[14-15]。但既往研究没有发现技术维度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存在影响,原因可能是城市创业对创业者人力资本的要求更高。技术娴熟的农民工可以成为高级打工者或返乡创业当老板,但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城市创业者。

大多数关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均是横向研究,我们仍不清楚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创业者两个转变中的实际作用。第一个转变是农民工从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但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就业稳定性等远不及首属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者。而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同质性,即由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就业特征的异质性并没有得到体现,这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而言是极不公平的[16]。为了突破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职业发展的束缚,一部分农民工从打工转向创业。创业虽然也很艰难,但在社会分层的阶梯上毕竟上了很大一个台阶。用他们的话来说:"以前是为别人打工,现在是为自己打工,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第二个转变是农民工由生存型创业者①向发展型创业者②的转变。农民工在城市创业一般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创业,二是创业可以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由于自雇与雇佣他人在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存在明显的职业地位差异。所以,大多数农民工一旦走上创业之路,就会努力提高创业绩效,以实现由个体户向私营企业主的转变,即本研究所说的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变。那么,人力资本在这两个转变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呢?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变化对其进入初次创业与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③的影响。由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包括:

假设 1:人力资本较多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比人力资本较少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更早进入初次创业。

假设 2:人力资本较多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比人力资本较少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更早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

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农民工城市创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组设计的抽样调查。2014 年 7—8 月课题组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的 13 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济南、青岛、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福州、厦门)④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抽样方案

农民工城市创业者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尤其以第三产业居多,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由于创业资本的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是自雇经营,只有少数是雇佣经营。

本次调查的总体为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13 个城市创业的农民工。由于抽样框不明,问卷调

① 生存型创业指的是创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求,成就动机较弱,资金投入较少,微利或保本经营,产品质量或服务水较低,管理水平较低,没有证照或证照不齐全。

② 发展型创业指的是创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成就动机较强,资金投入较多,盈利状况良好,产品质量或服务水较高,管理水平较高,证照齐全。

③ "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指的是农民工城市创业者在此次创业中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转变的时点。

④ 只涉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直辖市、省会城市、GDP 排名第一的地级市,因为这些城市创业环境差异不大,由此可以突出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与创业历程的影响。

查主要根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创业所在行业等变量进行定额抽样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60份,回收有效问卷921份,有效回收率为79.40%。此数据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关于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数据②。

(二)模型、变量与测量

1.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本研究使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检验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中的作用。事件史分析可以令人满意地解决变量的偏态分布、删截及动态自变量等历时数据中特有的问题,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其中所包含的相关事件明确的时间顺序,将因果关系定量地揭示出来[17]。由于调查采用的时间单位是年,本研究采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Discrete Time Hazard Model),该模型的方程是:

$$\log\left(\frac{p(t)}{1-p(t)}\right) = \delta(t) + b_1x_1 + b_2x_2 + \ldots + b_ix_i$$

其中,$\log\left(\frac{p(t)}{1-p(t)}\right)$ 是指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而言,事件在 t 时间点发生的机率(odds)的自然对数形式。$x_1 \sim x_i$ 是指所有的解释变量。除了那些不会随时间而变化的特征(如性别)之外,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时变变量。$b_1 \sim b_i$ 则是指每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delta(t)$ 是一个时间函数,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定义[18]。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时间函数 $\delta(t)$ 定义为一个常数。

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中,分析单位不再是个体,而是某一特定时间(这里是以年为单位)发生的事件(这里指的是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入初次创业或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在本研究中,第一个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入初次创业)的起始时间被设定为农民工第一份城市全职非农工作的开始时间。第二个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起始时间被设定为农民工此次创业的开始时间,直至2014年仍未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个案则被右截删(right-censored)。

2. 自变量: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

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由知识、技术、先前经验与城市生活经历四个维度构成。人力资本是随时间变化的,但某些人力资本变量如先前经验与城市生活经历难以通过回顾性问题测量其变化。因此,在本研究的事件史模型中,如果将人力资本作为时变变量,可以选择测量知识的指标——受教育年限,测量技术的指标——职业资格证书个数③,以及在某些研究中视为人力资本变量的年龄[19-20]。

既往大多数研究均用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测量知识。在本次调查中,按照不同受教育程度

---

①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24.7%,初中占61.2%,高中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在自营就业(即创业)的农民工中,制造业占10.7%,建筑业占5.9%,批发和零售业占39.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5.1%,住宿和餐饮业占8.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13.1%,其他行业占7.1%。

② 包括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第一份城市全职非农工作、第一份城市全职非农工作至此次城市创业之间的职业发展、第一次城市创业、此次城市创业(此次城市创业又包括转折点前的创业概况与目前的创业概况)四方面信息。

③ 在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创业绩效的研究中,没有将职业资格证书个数作为技术维度的测量指标,主要原因是为了方便填答,问卷中只要求调查对象填写最重要的三项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信息。

(定类变量)通常对应的年限,将其转换成连续变量即受教育年限[①]。职业资格证书个数是一个连续变量,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为了降低填答难度,问卷仅测量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而言最重要的三项职业资格证书的内容与获得年份,因而调查对象职业资格证书个数的取值范围在[0,3]之间。年龄根据风险年(即进入初次创业的年份或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年份)与调查对象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值来测量。模型中同时加入年龄的平方项,是为了检验年龄的非线性效应。

3. 控制变量

第一个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两组,第一组是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和初次创业前是否是中共党员。这三个变量都是虚拟变量,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编码如前,是否是中共党员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组(中共党员为 1,非中共党员为 0)。其中,婚姻状况是时变变量,性别和是否是中共党员是非时变变量。第二组是家庭特征变量,个人家庭背景较为复杂,通常主要考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经历,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因此,此处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初次创业前父亲的受教育年限、父亲是否是或曾经是个体经营者、父亲是否是或曾经是雇佣者和家庭经济状况。其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由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同前),是否是或曾经是个体经营者与是否是或曾经是雇佣者均为虚拟变量(是为 1,否为 0),家庭经济状况是将家庭存款减去欠债(包括贷款),单位是万元,也是连续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均为非时变变量。

第二个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控制变量也包括两组,第一组是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与婚姻状况,变量性质与编码同第一个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第二组是创业特征变量,包括此次创业启动资金、创业所在行业和创业所在城市,均为非时变变量。此次创业启动资金(连续变量)与创业所在城市(虚拟变量)的编码如前。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经营模式,创业绩效会有所不同,因此必须控制创业所在行业。在本研究中,行业是虚拟变量,共有 7 类,以批发和零售业为参照组,其余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与其他行业。两个模型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定类变量的描述统计(N = 778)

定类变量	有效百分比	定类变量	有效百分比
性别		城市类型	
男	36.76	一线城市	35.22
女	63.24	二线城市	64.78
婚姻状况		行业	
有伴侣	80.46	批发和零售业	38.82
无伴侣	19.5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7
初次创业前是否是中共党员		住宿餐饮业	27.76
是	7.7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1.34
否	92.29	制造业	2.83
初次创业前父亲是或曾经是个体经营者		建筑业	3.73
是	24.55	其他	3.86
否	75.45		
初次创业前父亲是或曾经是雇佣者		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是	9.38	是	76.22
否	90.62	否	23.78

① 其中小学未毕业的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年限为 3 年。

(三)结果分析

为验证人力资本的净效应,在两个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中,又包括两个子模型,第一个子模型只有人力资本变量,第二个子模型加入了控制变量。

表2 连续变量的描述统计 ($N=778$)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受教育年限/年	11.06	2.91
初次创业前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8.17	3.05
此次创业启动资金/万元	21.66	39.36
年龄/岁	34.52	8.03
初次创业前家庭经济状况/万元	5.08	10.08

1. 进入初次创业

表3报告了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进入初次创业的回归系数。其中模型A只估计了主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的效应。在模型整体检验通过($P=0.0000$)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受教育年限、职业资格证书个数和年龄对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的风险率高出5.1%($=e^{0.050}-1, P<0.01$)。职业资格证书个数每增多一个,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的风险率高出20.4%($=e^{0.186}-1, P<0.05$)。年龄的效应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表明开始时进入初次创业的风险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达某个最高点(这里计算得到的是大约41岁)之后,其风险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可能的解释是,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综合素质越高,一方面向上流动的动力越强,另一方面承担创业风险的能力也越强,由此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而职业资格证书个数表明调查对象专业技能的多寡,大多数农民工靠技术吃饭(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因此专业技能越多,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年龄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年轻人的工资水平较低,创业的机会成本较小,即使创业失败也可以从头再来;另外,年轻人的家庭负担较小(父母身体比较健康,有的还有经济能力,以及可以帮助抚养孙辈),创业的顾虑较少。但随着年龄增长,创业的机会成本逐渐增大,顾虑增多,由此进入初次创业的可能性减小。

表3 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入初次创业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估计

变量	模型A	模型B
人力资本变量		
受教育年限	0.050** (0.015)	0.031+ (0.018)
职业资格证书个数	0.186* (0.084)	0.189* (0.086)
年龄	0.173*** (0.033)	0.166*** (0.038)
年龄平方	−0.002*** (0.001)	−0.002*** (0.001)
控制变量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		0.117(0.087)
婚姻状况(以无伴侣为参照组)		0.072(0.128)
中共党员(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组)		−0.310(0.191)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44* (0.017)
父亲是或曾经是个体经营者(以不是个体经营者为参照组)		0.211* (0.104)
父亲是或曾经是雇佣者(以不是雇佣者为参照组)		0.456*** (0.137)
家庭经济状况		−0.006(0.005)
常数项	−5.436*** (0.485)	−5.671*** (0.547)
观察值	4812	4812
事件数	806	806
卡方值	102.69	134.97
Pseudo R^2	0.027	0.033

注: ***、**、*和+分别表示1‰、1%、5%和10%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模型 B 加入了控制变量,以验证人力资本的净效应。在模型整体检验通过($P=0.0000$)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职业资格证书个数和年龄的效应与模型 A 相同,但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仅在 0.10 的显著性水平上。这说明控制变量也对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构成影响。

如前所述,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在模型 B 中,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婚姻状况与是否是中共党员对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家庭经济状况之外,父亲的受教育年限、父亲是否是或曾经是个体经营者与父亲是否是或曾经是雇佣者对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的风险率高出 4.5%($=e^{0.044}-1, P<0.05$)。与父亲不是个体经营者的人相比,父亲是或曾经是个体经营者的人进入初次创业的风险率高出 23.5%($=e^{0.211}-1, P<0.05$)。与父亲不是雇佣者的人相比,父亲是或曾经是雇佣者的人进入初次创业的风险率高出 57.8%($=e^{0.456}-1, P<0.01$)。这说明,个体的非人力资本特征与家庭经济状况对调查对象进入初次创业没有影响,真正有影响的是调查对象父亲的教育程度与创业经历。可能的解释是,调查对象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眼界越开阔,对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而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初次创业则越早。有过创业经历的父亲,一般会将创业经验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下一代,从而有助于其更早地进入初次创业。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的发现相一致,即企业家精神可以在代际间传承[21-22]。

模型 B 表明人力资本较多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比人力资本较少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更早进入初次创业,假设 1 得到验证。

2. 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

表 4　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估计

变量	模型 C	模型 D
人力资本变量		
受教育年限	0.017(0.021)	0.018^{+}(0.022)
职业资格证书个数	0.172^{+}(0.093)	0.122^{+}(0.095)
年龄	0.035(0.044)	0.066^{+}(0.057)
年龄平方	−0.000(0.001)	−0.001^{+}(0.001)
控制变量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		0.213^{+}(0.118)
婚姻状况(以无伴侣为参照组)		−0.111^{+}(0.174)
此次创业启动资金		−0.001^{+}(0.002)
一线城市(以二线城市为参照组)		0.165^{+}(0.114)
行业(以批发和零售业为参照组)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574^{+}(0.308)
住宿和餐饮业		0.143^{+}(0.13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297*(0.142)
制造业		−0.210^{+}(0.379)
建筑业		−0.427^{+}(0.287)
其他		0.509^{+}(0.297)
常数项	−2.965***(0.760)	−3.740***(0.924)
观察值	3459	3459
事件数	449	449
卡方值	6.36	27.21
Pseudo R^2	0.002	0.011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表4报告了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回归系数。其中模型C估计了主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的效应,但模型整体检验没有通过($P=0.1737$)。模型D加入了控制变量,以验证人力资本的净效应。在模型整体检验通过($P=0.0181$)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人力资本变量对调查对象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但都只是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体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调查对象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高出1.8%($=e^{0.018}-1, P<0.10$)。职业资格证书个数每增多一个,调查对象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高出13%($=e^{0.122}-1, P<0.10$)。可能的解释是,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综合素质越高,其机会识别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管理决策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均在创业中有很大的提升,由此创业绩效越好,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越早。农民工创业大多数依靠其掌握的专业技能,专业技能越多,创业能力越强,创业绩效越好,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越早。与模型A和模型B相同,在模型C中,年龄的效应也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表明开始时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达某个最高点(这里计算得到的是大约33岁)之后,其风险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一般来说,年轻人的机会识别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较强,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及时把握机会、积极拓展市场,由此创业绩效较好。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资源获取能力与管理决策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机会感知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的不足,使得他们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多数人停留在原来的创业层次,即生存型创业,难以向发展型创业转化。

在模型D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的控制变量对调查对象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个人特征变量中,男性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比女性高出23.7%($=e^{0.213}-1, P<0.10$)。可能的原因是,男性更具有开拓进取精神,而女性相对保守,由此男性比女性的创业绩效更好,更早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有伴侣的创业者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只是无伴侣创业者的89.5%($=e^{-0.111}, P<0.10$)。对此的解释与性别类似,相对于有伴侣者,无伴侣者的顾虑较少,开拓性较强,由此创业绩效更好。但从数据上看,两者的差异还不是非常明显。在创业特征变量中,相对于二线城市的创业者,一线城市的创业者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高出17.9%($=e^{0.165}-1, P<0.10$)。此点可以从不同城市的创业环境来解释,一般来说,一线城市的创业环境更好,如市场规模大、市场开放度高、基础设施良好、法律政策完善等,由此更加有利于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提升。行业的影响稍显复杂,以批发和零售业为参照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创业者更早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但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创业者更晚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可能的原因是,与其他行业投资收益见效较快不同,制造业与建筑业的投资较大,资金回流的周期较长,因此在创业绩效上的反映通常比较迟滞。此外,此次创业启动资金每多1万元,调查对象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的风险率将减少0.1%($=1-e^{-0.001}, P<0.10$),由于值太小,可以忽略不计。

模型D表明人力资本较多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比人力资本较少的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更早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假设2得到验证。

三、讨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主体在不断发生变化,不仅平均年龄变小、教育程度提高,而且向上流动的动力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挣口饭吃,养家糊口,而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职业发展,进而实现身份转换。建国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阻滞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在职业转变的同时无法实现身份转换,这是极不公平的。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如果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仍然是低层次的,主要靠出卖体力,而不是脑力,那么在体力劳动者大量供给的情况下,其

身份转换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年老体弱返回农村是农民工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从职业发展而不是职业转换的角度考察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才能既有助于农民工的个人成长,又有助于社会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呢? 人力资本相对于社会资本而言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诚然如科尔曼所说,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有着重要影响,但对于个体的职业发展而言,社会资本是间接影响,而人力资本是直接影响。因此,在农民工城市创业研究中,我们必须在关注社会资本作用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作用的探索,本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尝试。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东部 13 城市农民工创业数据的事件史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有着显著影响;第二,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有着显著影响。尽管由于数据搜集难度的限制,问卷中没有测量人力资本的另两个维度——先前经验与城市生活经历随时间变化的信息,但本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往创业研究缺乏纵向研究的不足,即仅仅研究人力资本对当前创业的影响,而不说明人力资本在创业过程中的持久作用。显然,说明人力资本不仅对当前创业有影响也对其未来发展有影响,才能更充分地表明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创业中的重要性。

从本文的结论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与其他创业者群体一样,农民工如果要想在城市取得良好的创业绩效,也需要丰富的人力资本,没有任何人力资本的积累,仅仅凭借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盲目创业并不可取。而且,大多数农民工经济资本微薄,社会资本同质,如果人力资本较少,其在城市成功创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看来,社会上流行的关于草根创业的神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绝大多数缺乏良好人力资本的草根创业一直徘徊在低端,举步维艰,即仅仅是生存型创业。所以,与其倡导全民创业,不如提升创业者与潜在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帮助其开启创业,并促使其尽快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舒尔茨认为,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投资是非常关键的。就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而言,在政策层面可以考虑如下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加强学历教育。一般来说,个体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综合素质越高。因此学历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基础,且学历教育本身对职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目前,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农村已经基本普及,但随着考重点大学和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加大,不少初中生毕业后就直接外出打工。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负担,增加了家庭收益,但由于教育程度较低,农民工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作。而如果创业,受制于综合素质,大多数人也只能是生存型创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提升农村高中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品质,让更多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学生接受高中教育,让更多工作后还希望继续深造的农民工能够接受大学教育。

第二,加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包括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前者包括以在校生为主要对象的“职业准备教育”,后者即职业培训。对于职前教育,当前特别需要加强的是职业教育内容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相匹配,否则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而职后教育,目前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在很多方面(包括师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间与地点等)存在不足,需要尽快完善。同时,无论是职前教育还是职后教育,都应当与职业资格认证联系起来,由此促进农民工主动接受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技能[23]。

第三,加强创业教育。创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就业,因此,除了加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外,还必须加强专门的创业教育。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并把农民工涵盖进来。如辽宁沈阳市将农民工纳入青年创业促进会服务范围,并对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进行普惠制创业培训,由相关部门联合举办了首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培训班,同时,青年创业促进会还计划提供新生代农民工为期 3 年的“一对一”创业导师陪伴服务[24]。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创

业教育体系尚处待建状态。未来可以结合创业过程(包括创业前阶段、创业阶段、早期成长阶段与晚期成长阶段)中农民工可能碰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帮助农民工成功创业。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开启城市创业与创业层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年龄、教育程度、从事行业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必须高度重视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由此才能促进其职业发展,并真正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转换。

参考文献:

[1]张玉利,王晓文. 先前经验、学习风格与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1(3):1-12.

[2]PRIYANTO S H, SANDJOJO I.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nd venture success: Empirical study on SE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5(5/6):454-468.

[3]NAKHATA C.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on the career success of SME entrepreneurs in Thailand[J]. The Business Review, 2007(1):62-69.

[4]MARVEL M R, LUMPKIN G 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its effects on innovation radicalnes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6):807-828.

[5]SANDBERG W R, HOFER C W. Improving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trategy,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entrepreneur[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87(1):5-28.

[6]SHANE S,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1):217-226.

[7]BROWN, et al. An operationalization of stevenson's conceptu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s opportunity-based firm behavior[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10):953-968.

[8]DELMAR F, SHANE S. Does experience matter? The effect of founding team experience on the survival and sales of newly founded ventures[J].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6(3):215-247.

[9]黄兆信,吴新慧,钟卫东.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多个城市的实证调查[J]. 江西社会科学,2012(9):231-235.

[10]林斐. 对90年代回流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经济,2004(2):50-54.

[11]郭红东,丁高洁. 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8-85.

[12]朱红根. 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西调查数据[J]. 财贸研究,2012(1):18-26.

[13]赵浩兴,张巧文. 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创业企业成长关系研究——基于江西、贵州两省的实证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13(1):130-133.

[14]周晓虹.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 社会学研究,1998(5):58-70.

[15]高文书. 人力资本与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09(3):38-43.

[16]刘传江,董延芳. 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J]. 人口研究,2007(6):8-15.

[17]郭志刚. 历时研究与事件史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1(1):67-72.

[18]吴愈晓.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 社会学研究,2010(2):125-150.

[19]刘精明. 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1(6):1-18.

[20]陈昭玖,朱红根.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可获性研究——基于江西1145份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1(5):54-59.

[21]SZELENYI I. Socialist entrepreneurs[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22]吴晓刚."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J]. 社会学研究,2006(6):120 - 146.
[23]李俊. 职业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J]. 中国青年研究, 2014(12):52 - 58.
[24]李远煦,黄兆信,钟卫东.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教育与公共政策选择[J]. 教育发展研究,2011(21):42 - 46.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on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LI Ju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n a survey in thirteen eastern cit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human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Firstly, human capital is effective in their entering the first venture. Secondly, human capital is influential in their entering turning point of this venture. Thus,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helping them enter the first venture and turning point of this venture on the premi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migrant workers; urban venture;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